



CCLC NEWSLETTER



第十八卷 第三期

Vol.18 No.3

雙月刊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PUBLISHED BIMONTHLY BY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一九九七年五月

May 1997

沈以藩主教神學思想述評

——平凡的智者、時代的先知（一）

關保平牧師

「沈以藩主教被列入普世教會偉大領袖的行列，不是因為他作了驚人的事情，乃是因為他見證了耶穌基督與他同行的經歷。」¹ 他是一位平凡的主教。他待人和藹，言辭謙卑。他對教會殷勤事奉，不敢懈怠。他的可貴之處在於他能通過自己平凡的見證，把人引向偉大之處。用平凡的語言表達自己對一個新時代的遠象。

筆者與沈以藩主教接觸不多，和他時間最長的一次談話是在他歸天之前的兩個月。談話中，他流露出了他的擔憂：對一個時代的擔憂，對中國教會在這個時代中的作用的擔憂，以及對教會在這個時代中自身價值觀的危機的擔憂。他是一位平凡的主教，但他是一位先知，一位時代的先知。他能透過現實的迷霧看到未來的遠象。他能感覺到時代的脈搏。他能在平凡的生活中聆聽到神對他的呼召，他能在人們安於現狀的時候發現潛在的危機。

沈以藩主教歸天後，筆者把他生前的文字搜集起來仔細拜讀，並突發奇想，想把他的思想介紹給海內外的基督徒，一方面以此來寄託筆者對主教的哀思，並告慰主教的在天之靈，另一方面為使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思想，他的擔憂，他的告誡以及他的遺憾。筆者因才疏學淺，加之拙文完成於倉促之間，難免有謬解之處，還望廣大同仁能予以斧正。

一、在處境中建立

沈以藩主教於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出生於一個三代基督徒的家庭裡。一九四四年進入南京金陵大學哲學系

攻讀哲學。一九四八年畢業後，即進入中華聖公會中央神學院研究科學習神學。一九五一年神學畢業，在上海聖公會諸聖堂服侍，一九五二年接受聖公會會吏聖職。主教讀神學期間正值中國兩個時代的交替。一個舊的時代過去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來到了。對於中國教會來說，傳教士的時代過去了，由中國基督徒獨立自主辦教會的時代到來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沈以藩主教神學畢業，並到堂會工作。

通過在堂會的事奉，主教發現了教會所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危機。基督教在鴉片戰爭後進入中國。與其說是靠聖靈的帶領，還不如說是靠人為的因素。而對這些人為因素的忽視，特別是在義和團運動之後，導致這些因素在教會中逐漸發展成爲一種教會心態，即：「基督教是一種進步的力量，它把西方文明的益處帶給愚鈍的中國人。」²。而西方文明包括西方人的生活習慣、價值觀，甚至支持他們的西方的炮艇。儘管有的傳教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爲了福音在中國的傳播作了很多工作，但忽視了如何在中國建立適合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教會，而只是把他們認爲是正確的信仰、神學、教會模式帶到中國。當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基督徒開始自己管理中國的教會，他們發現他們面對著很多不和諧，其中表現最爲突出的是神學上的不和諧。而在神學上，最爲突出的問題是舊的神學注重於教會與社會間不可跨越的鴻溝，這也許還是中世紀傳統的延續。而中國信徒強調的是見證，「見證基督的復活」，這是「任何時代福

音的中心信息。」³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人民都在以空前的熱情建設社會主義祖國。教會應如何對待這一事實？沈以藩主教指出，「今天教會所需要的，是通過信徒悔改重生的生命來表彰基督復活的大能。」⁴

中國教會要為復活的主作見證，它自己首先必須是一個復活的、有生命的教會。在新的形勢下，中國教會顯得手足無措，因為它的神學不能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在舊中國，教會僅僅強調的是個人得救。試圖參與社會革命，支持社會公義的努力很容易被視為「世俗」，而得救之道只在個人靈修，靜候主的再來。沈主教批評說：「教會在歷史中往往成為維持現狀的，甚至保守崇古的力量。」⁵在新的形勢下，這種教會顯然已不符合廣大信徒的需要，更不符合人民的需要。因此，如何使教會能夠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如何能夠使教會為復活的主在中國作出又新又活的見證，成為當時廣大教牧同工和信徒最關心的問題。生活在兩個社會制度的轉折點，經歷了在這個轉折點上中國教會的變革，沈主教深有感觸：

「關於末世的信仰往往被人理解為歷史的終結、一切的毀滅，這是不合主的教訓的。主論到自己的再來，一方面是舊時代的結束，另一方面是新時代的開始。一切關於人世的災難，甚至天勢的震動的描敘，都是說明舊的權勢、秩序、傳統都要崩潰。然而，這不是一切的終結和毀滅，相反地，人應當從中看見徵象，知道新的時代由之而孕育，並且即將來臨。……因此，聖經中關於末世盼望的教導，其主調不是悲觀的、失望的、無可奈何中的安慰，而是滿懷喜樂、滿懷希望、奔向主在我們前程中的呼召。……末世的盼望不使我們懷戀過去，固步自封，相反地，它正能將我們從舊時代的束縛影響中釋放出來，讓我們載欣載奔地前赴新時代中主所預備的美事。」⁶

他感受到了在這個新時代裡神對中國教會的呼召，他也看到了舊神學的危機。他認為基督徒應在這個新的時代裡充滿信心，而非悲觀、失望。因此，他大聲疾呼，呼籲教會要有新的遠象，要吐故納新，要解放思想，跟上時代的步伐。

1955至1958年沈以藩主教任中華聖公會總議會常務委員辦事處幹事、中華聖公會首席主教代牧。1958年被按立為牧師。在這個期間，牧會經驗使他對教會和信徒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作為辦事處幹事和主教代牧，他能夠有機會從更廣泛的角度來分析中國教會所存在的問題。一九五八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使當時正在思考的中國教會更是不得不作出抉擇。這時的社會處境不允許教會作騎牆派，它必須作出抉擇。是打破舊的禁錮，使教會傳統向前發展，還是保守昔日的一切，寧願與人民隔絕，是在社會生活中為基督作見證，還是閉門

自省。在此之前由中國基督徒發起的三自愛國運動為前一種選擇鋪平了道路。但也有人選擇了後者。而後者的指導思想基本上是以「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轡」為基礎的，強調信與不信者之間的對立。⁷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會更是不能參與社會，以顯明教會的獨特性和聖潔。沈以藩主教深刻剖析了這種思想，並指出其與福音真理的不和諧之處，

時至今日，福音竟被歪曲為個人主義的追求和滿足，以信仰為獲致今生來世身體靈魂一些福樂的敲門磚。福音實際被貶低到可悲的地步。

上帝的愛首先就是要將我們從個人私欲中拯救出來，如果我們所傳的福音竟是鼓勵了個人得利的追求，這不能不是對福音嚴重的歪曲。⁸

基督教信仰要求每個信徒都有個人靈性追求的生活，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個人的靈性追求並不意味著宗教個人主義，並不意味著基督徒必須遠離社會方能成正果。而耶穌一生的言行卻正說明，基督徒的生活必須是奉獻的生活，愛的生活，宣揚公義的生活。奉獻不是從狹義上理解的獻身與教會，脫離塵世，而是為了使世界變得更符合神太初創造的旨意，而在獻身於教會的同時，在社會生活中作出社會見證。沈主教批判的正是只注重個人的靈修生活，不參與社會的生活態度。顯然，這種態度與耶穌為人治病、與罪人交朋友、使飢餓的人們得以飽食的生活實踐是不一致的，也是與耶穌譴責法利賽人的假敬虔、要求人們順服掌權者、反對猶太人僵化地看待舊約誡命的態度不協調的。

如何使教會與當時的社會相協調，廣大信徒如何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真正地成為人民的一部分？這是沈主教所關心的中心問題。他決不把信仰與對祖國的熱愛割裂開，而是把二者聯繫起來。他說：

我們當在禱告的祭壇經常為祖國人民祈求和感恩。我們的禱告有時忽略了為國家感謝和求福，這絕不是我們「靈程」太高，而乃是我們愛心的缺乏。……願主同樣地激勵我們，使我們對廣大人民有無限的熱愛，使我們經常為祖國祈求和感恩，又使我們在祈求感恩中汲取力量，為祖國更繁榮幸福的未來，獻上自己的一切。⁹

他所追求的靈性的境界不是閉門追求所能得到的，而是只有把個人的靈性經驗和與廣大人民結合一道的社會實踐方能達到。他不以與世隔絕為榮。反因看到廣大人民為了建設新中國「不顧犧牲地忘我勞動」而「更看到自己的生命處在重重捆綁中是何等軟弱與貧乏。」¹⁰他這種對待信仰和生活的態度，無疑，是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的。當然，他採取這種立場不單單是為了迎合社會的需要，而是出於他的遠象，因為他看到了教會在這個新時代的遠象。他本著一顆謙卑的心，盡力不從自以為是的角度看問題，也盡力避免屬

靈的驕傲，而是力求「對於一切新生的事物，時代的跡象不懷成見，卻是十分敏感，善於從中認識上帝旨意的引領。」¹¹ 留心傾聽上帝親自對我們說話，這是沈以藩主教的中心思想。不要被過去的經驗所羈絆，不能以人的好惡代替神的旨意，我們要在自己的處境中順服神的旨意，聆聽神的話語。

可惜，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教會和許多學校及研究單位一起被關閉了。

二、在事奉中成長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先生提出的「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政策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在這項政策的影響下，教會重新獲得了自由。從一九八零年起，「文革」期間被關閉、佔用的教堂陸續重新開放。沈以藩主教也於1981年作了上海國際禮拜堂的主任牧師。中斷了差不多二十年後，主教又開始了他的神學思考。

重新開放後中國教會繼續進行在「文革」期間被迫中斷的對「三自」原則的神學思考，並提出了在「三自」的基礎上實現「三好」的新目標。¹² 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是中國教會在思考的年代，也是中國教會的神學思想最為活躍的年代。當一九五零年中國基督徒發起「三自」運動的時候，主教還在神學院讀書。八十年代初，當中國教會對「三自」原則進行再思考時，他已是一位資歷頗深的主任牧師。凡與沈主教稍熟的人都會發現，主教是一位謹言慎思，不輕易發表自己見解的人。他言談不多，但不停地思考。經過了幾十年的思考，他深刻認識到：

三自愛國運動從根本的意義來說，不只要擺脫外國勢力對中國教會的控制，更是要建設一個與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相稱的教會，要建設一個與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與中國優秀的歷史傳統文化相結合，與今日正在為壯麗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的中國人民相結合的教會。如果我們中國教會一方面實現了自辦、另一方面我們所建設的教會是脫離廣大人民的，甚至是與廣大人民對立的，我們在宗教上所帶領的信徒是對祖國的現實鬥爭無動於衷的，甚至是嚮往西方的，這樣的教會豈不是在精神上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這樣的教會又怎能在我們社會主義祖國高舉主的福音，完成它屬靈的使命。¹³

可以看出，沈主教在繼續著他五十年代所思考的問題，即如何把中國教會辦成爲一個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情相適應的教會，一個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的教會。主教所談到的中國教會的獨立自主，不單單是指教會的行政管理，而是思想上的獨立自主，是更深一層的教會本色化和神學處境化問題。

儘管基督教（新教）進入中國已有幾百年，但它只

是西方人的教會的摹本，無論從禮儀上、思想上、形式上都基本完整地保存了西方教會的原貌。¹⁴ 所以，時至今日，還有人把中國基督教稱爲「洋教」。「三自」運動的主旨之一也是要改變這個「洋教」的面貌。意識到「洋教」形像並進行改變的努力由來已久，但這些努力多數只限於注重教會的外在形像，而很少從根本問題上，即神學上進行思考。五十年代的「三自」革新運動打破了以前的僵局，它從新的角度對教會的神學體系進行了再思。中國教會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所進行的思考正是延續了「三自」運動的思路。而在舊的神學體系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甚麼呢？沈主教認爲，是「需要從中國過去和現在的文化中吸取營養，來建立我們自己的神學思想體系。」¹⁵ 他說：

「中國的神學思想必須首先清除其殖民主義的污穢。……建國初期那幾年的神學醞釀，遇到了某些極端的神學觀點的挑戰。這些觀點的特點是把上帝與世界、靈魂與身體截然分割開來的二元論，認爲世界是全然黑暗的，是與上帝的光對立的，提倡一種敵視世界因而也敵視一切非信徒的態度。¹⁶（待續）

注釋

1. 「約翰斯·約翰遜主教的悼詞」《天風》1994年第十期，第12頁。
2. Stursberg, Peter. *The Golden Hope*. p.39.（出版社不詳）
3. 沈以藩「不再爲自己活，乃爲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天風》1954年第十四、十五期，第8頁。
4. 同上，
5. 同上，
6. 「基督徒平默想四則」《天風》1958年第一期，第22頁。
7. 王明道是這種思想的代表之一。他所定義的作見證並非指在社會生活中爲福音作見證，而是指以遠離「罪惡」來顯明基督的聖潔。他認爲基督徒作光是爲了使愛基督的人愛基督徒，而使恨正義的人恨基督徒。這顯然與耶穌所指的作光有概念上的差異。見《我們的主》（王明道講道集），1953年，第83頁，出版社不詳。
8. 「基督徒平默想四則」《天風》1958年第一期，第21頁。
9. 「我們起來建造吧！」《天風》1959年第十九期，第22頁。
10. 「上帝的大能」《天風》1959年第二期，第23頁。
11. 「耶穌生平默想四則」1958年第一期，第22頁。
12. 「三自」指自治、自養、自傳。「三好」是指治好、養好、傳好。
13. 「把三自精神貫徹到基層教會中去」《天風》1983年第二期，第24頁。
14. 直到現在，教會中還是流行著當年傳教士所講的不符合中文語法的中國話，如「有一個看見」，「有一個聽見」等。教會中所唱的讚美詩儘管有四分之一是中國人自己寫的，但很多仍然用的是西方音樂的曲式。基督教中受到希臘哲學影響的精神物質對立的二元論，以及猶太人傳統中的天人對立的二元論思想在中國教會成爲正統。這一切都使許多中國人（當然不是全部）感到陌生。
15. 「中國基督教的神學思考」《金陵協和神學志》1995年12月，第三期，第33頁。
16. 同上，第30-31頁。

普頌詩伴

黃永熙

一首「德冠章戴」的聖詩(二)

1977年在香港出版的《普天頌讚》也選用了這詩，但認為「米勒禮堂」的調子太過嚴肅，而福音詩歌的調子則太過輕鬆，於是由筆者另譜一調，稱為「華北」，以表示這首歌詞的來源。中文歌名也和其他西方的詩集一樣，採用了章文新博士的譯詞。這詩頗受歡迎，甚至有人在婚禮中選唱它。

1985年聖誕筆者帶領「香港聖樂團」往上海演唱。臨離上海時一位朋友送給筆者一本剛出版的《讚美詩—新編》線譜本。返港後，當筆者翻閱該詩集時，發現第21首「贊父奇愛歌」的歌詞就是《普天頌讚》第37首的「榮耀歸神歌」。而且註明原詞的作者是英國的德克（James G. Deck, 1802-1854）⁵ 英文的首句是 "Father, 'twas Thy love that knew us" 這個發現對許多人來說是不免有點失望，因為在過去多年來，大家都以為那是一首中國人的創作，到現在才發現原來是一首“德冠章戴”的譯作。根據朱利安所編的《聖詩學大字典》（*A Dictionary of Hymnology* edited by Julian）這首 "Father, 'twas Thy love that knew us" 最初出現於 G. V. Wigram "Hymns for the Poor of the Flock" 和 Charles Haddon Spurgeon 所編的 *Our Own Hymn Book*。兩詩集都是在英國出版。

1986年春筆者趁返美渡假期間，在紐約和羅徹斯特兩地的神學院搜索這詩。在羅徹斯特的科蓋脫神學院（Colgate Rochester Divinity School）找著一本 *Our Own Hymn Book*，但只有兩節歌詞。後來在其他詩集裡找到所有四節。

找到原作本來是一件興奮的事。但對筆者來說，這個發現帶來相當大的困擾，因為章博士由一首中譯再轉為英文的歌詞的確是一首傑作，況且許多本西方的詩集已採用了它。此外章博士在三十年代已在出版《普天頌讚》的事工上花了許多心血（請參閱註¹），這是他留下來的我們可以用來記念他的唯一一首聖詩。也許將來在《普天頌讚2000》的版本裡，我們把德克的原詞和章博士的轉譯都登錄出來，讓選詩者隨意採用。本文讀者如有更佳的辦法，尚祈不吝賜教。（全文完）

注釋

(5)有關德克的背景，可參閱《讚美詩新編史話》第21首。

(6)根據《讚美詩—新編》所載第21首「贊父奇愛歌」的調子是 George C. Stebbins 所作，但根據另一詩集，這曲的作者 Philip P. Bliss 是美國另一位著名的福音詩歌作者。這又是一件「張冠李戴」的案子。筆者目前尚在追查考究，看看到底是誰戴的冠。

參考資料

1. "A Dictionary of Hymnology" Edited by John Julian
2. "If Such Holy Song" — The story of the hymns is THE HYMNBOOK 1971 by Stanley L. Osborne, The Institute of Church Music, 1976
3. "Companion to the Hymnal", Abingdon Press, 1970
4. 《歲月如流》——章文新著，陳錫麟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69
5. 《讚美詩（新編）史話》王神蔭編著，中國基督教協會出版，1992
6. 《向歷史交代》——黃永熙著，紐約中國基督徒團契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90

《普天頌讚2000》徵求華文新創作

普天頌讚修正本自1977年出版至今已二十年。當今社會變遷迅速，一本聖詩集經過了二十年的歲月亦應考慮重新編訂，除了刪除一部分舊詩之外，亦須增加一些新詩，以應新時代的需要。除了從西方最近二十年來所出版超過千首新詩中選擇之外，亦盼望能徵求一些國人的新創作。因此本委員會向海內外公開徵求下列各題材的新詩：

- 一、以基督的教導融匯中華文化；
- 二、敬老、思親；
- 三、耆老心境；
- 四、以華人固有人倫觀念培育新一代；
- 五、面對科技的突飛猛進而保持固有的優良文化；
- 六、種族共融、社會關懷、婦女。

來稿請於九月底前寄至香港九龍彌敦道138號五樓A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收。

普天頌讚2000聯合委員會啓

彼此對唱、同心和應

推動在崇拜中，用優質中文聖頌獻唱

《聖頌選集》第五集《讚美我聖父》收錄了9首聖詩所編成的聖頌，詩歌有屬靈深度，文辭、音樂上乘，並可邀請會眾參與。

《崇拜短頌集》內收錄的乃是由譚靜芝博士所精選並翻譯的36首優質短頌，以供教會崇拜中應用。（本集之鐳射唱片，稍後出版）

《親來品嘗》聖頌精選鐳射唱片收錄的15首聖頌，是選自本社出版的雙語詩集《頌讚詩集》及《聖頌選集》一至四集，由黃永熙博士指揮，中華基督教聖頌團以普通話頌唱。

《聖樂崇拜初探》收錄了三篇討論聖樂及崇拜的短文：

1. 崇拜與崇拜程序的意義；
2. 從保羅的教導略談教會音樂的基本理念；
3. 聖樂崇拜設計個案淺析。

並附96年4月14日舉行的「復活節感恩聖樂崇拜」的程序和現場錄音。



新書介紹

每日研經叢書 全套最後兩冊

《耶利米書（下冊）·

耶利米哀歌注釋》

戴衛遜著、古樂人譯

《約伯記注釋》

紀博遜著、古樂人譯

香港教會名錄 '97/'98

本名錄詳載全港基督教會與有關的機構、神學院、醫院及學校等最新資料，為教牧、校長、機構負責人必備的工具書。



《二十世紀宗教思潮》

依原書第四版修訂本

麥奎利著 何蒞莎譯

一本了解二十世紀西方神學思想必讀的好書

華人神學學者鄭重推薦！

本書是牛津大學教授約翰麥奎利的精心巨著。

麥奎利教授是英國著名的神學家，他把剛過去一百年西方的宗教及神學思潮，巨細無遺地介紹出來，資料豐富和詳盡，仿如一本二十世紀神學思想的百科全書。



一、人事動態

- 3月25日本社年會中選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職員：主席——沈冠堯牧師，副主席——高荻華女士，司庫——曹敏敬牧師，書記——馮壽松校長。此外，並邀請得下列人士為本社執行委員：梁林開牧師（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陳衍昌牧師（聖公會），翁傳鏗牧師（中華基督教會）。
- 社長蘇成溢牧師被醫院管理局繼續委任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大埔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之管理委員會成員；任期至1999年3月底。

二、嘉賓到訪

- 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教師闕保平牧師於3月10日到訪本社。
- 章德英女士，本社舊同事，亦是《中學生頌讚》的編輯，於3月24日偕夫婿到訪本社。
- 香港市政局翻譯主任郭麗玲女士於4月8日到訪本社。

三、中國神學培才計畫

- 本社由97年1月起推動之「中國神學培才計畫」，現已收到奉獻港幣貳萬餘元，與目標差距尚遠，請繼續紀念中國神學教育的需要。

四、事工活動

- 本社應澳門馬禮遜學校及蔡高學校之邀請於3月31日前往主領「閱讀好友營」，共有四十餘位學生參加。



● 聖樂事工



〈崇拜短頌應用〉研習坊

日期：1997年5月4日（主日）
 時間：下午四時至六時
 地點：聖公會聖三一堂（上期通訊地點未能借出）
 主領：譚靜芝博士
 範唱：聖詠小組
 內容：探索短頌在崇拜禮儀程序中的運用。

VISITORS

- Rev. Pao-Ping Kan from Naging Theological Seminary visited our office on 10th March.
- Ms Dorothy Jones, our old friend with her husband Mr. Omar Hartzler visited us on 24th Marc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 The CCLC AGM was held in March, 1997, during the meeting Rev. Abraham Sen was elected as the Chairman, Ms. Siu-Wah Ko as the Vice Chairman, Rev. Man-King Tso as Hon. Treasurer and Mr. Sau-Chung Fung as the Secretary.

SEMINAR

- We were invited by the Macau Choi Kou Primary School and R. Morrison Memorial School to hold a seminar on reading for P.6 students during Easter. There were over 40 participants.

THEOLOG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FUND FOR CHINA

- We are very thankful for those who have supported this project. We have received about HK\$20,000.00 donation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January this year. However, it still falls far short of our target. We need your continual support & prayers so that we could supply more theological and reference books to meet the need of seminary teachers and students.

。本社門市部

盤點大傾銷

所有貨品 特價發售

1997年5月1日-31日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10:00A.M.-6:30P.M.

星期六：10:30A.M.-5:00P.M.

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領詩要訣〉研習坊

日期：1997年5月31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地點：聖安德烈中心一樓禮堂
 主領：丘日謙校長
 內容：研習在學校及教會內領詩的竅門、技巧並選曲的要訣。

* 費用：每講八十元，三人或以上集體報名八折 *
 如有查詢請電 2367 8031, 2385 5880

香港基督徒對九七的經歷和反應

蘇成溢

一、「九七」的緣起

香港的一九九七問題，源於百多年前滿清時代的幾次戰役和條約安排。1842年因鴉片戰爭中戰敗，中國被迫簽下「南京條約」，其中一項是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再敗後，另簽了「北京條約」，把九龍半島一部分割讓為永遠租借地。及至1894年；英國以防衛香港為理由，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九龍半島全部北至深圳河以南，從1898年6月9日起，租借99年，到1997年止。

由於整個香港的發展，是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市區、新界及附近海域內的島嶼，再加上1949年後中國大陸政府並不承認滿清時代的不平等條約，因此1997年九龍半島北部及新界地區的租借地限期，（這片租借地佔了全香港總面積的百份之九十），並非只是談是否續借的問題，乃是關乎香港整體的身分誰屬，前途如何的事。

二、八十年代初香港教會對「九七」的看法

「九七」問題正式公開提出來討論，是八十年代初英國首相訪問北京後開始的。從1981年起，中國大陸政府十分清楚地表達，會根據1997年這個時間表上的限期，正式在香港行使其國家主權，並會與英國及香港政府，透過談判來安排香港在這個日子前後的一切過渡事宜。

在1981-1983年間，香港教會進行了各種不同形式的研究和討論，也出版了不少切合主題的書。¹

綜觀八十年代初香港教會對「九七」前景的看法，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一）**認同中國人的身分**。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李熾昌教授，引用耶利米的歸回故土的遠象說：「當我們考慮香港的前途問題時，是否能夠以整個民族作出發點？以中國人的命脈為大前提？」² 另一位資深牧者更提醒教會牧師應幫助信徒重拾這個遺忘了的國族身分。³

（二）**鼓勵香港人積極參與社會**。香港協同神學院前任院長丘恩處博士勉勵香港的基督徒：「須以行動來表達他們的信仰。不但要盡基督徒對社會的職責，也要覺醒其他的人。」⁴ 香港一間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的負責人當時指出：「香港教會應視香港地位的變遷，是上帝藉以喚起教會對社會責任醒覺的媒介……」⁵

（三）**教會應該勇於承擔使命**。所謂承擔的使命，大致可分為：（甲）對中國大陸的福音使命。⁶（乙）對塑造香港未來的使命。香港基督徒學會總幹事郭乃弘牧師在1984年曾公開呼籲：「今天我們便要作好準備，在領袖

的培養上，和在市民政治意識的培育上，多下工夫。」⁷

總的來說，當「九七」問題一開始浮現的時候，香港教會的回應是快速的、積極的、樂觀的、也具有很強的外向性。然而隨著中英雙方對製訂香港前途模式的談判，和中國大陸籌劃落實香港特區基本法逐步進行，香港人一些真實的心理反應，開始在社會中呈現出來，以致情況產生了變化。

三、1982—1992香港的變化和教會對前途的回應

1982年至84年是中英兩國代表為香港前途談判的時期，有關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於84年1月在北京正式簽署，及後香港特區的「基本法」亦於1991年落實。表面看來香港的未來似乎已安排妥當了，香港人理應樂於接受這些「安定繁榮」和「平穩過渡」的預備。但是在1982—1991這十年裡，香港人卻經歷了社會中很多衝擊和變化。例如從1982—1991香港政府逐步引入民主選舉於各級議會而產生的政治變化，1982—84及87年因金融危機而產生的經濟變化，和1989年6月4日前引發的愛國心態的變化等，都對香港人帶來很多衝擊。更有甚者，是激發了移民海外的潮流。據一些資料顯示，在82—89的七年內，共有約十五萬人移民海外，而89—91年裡更達到十八萬以上，趨勢一直沒有大的減退。⁸ 很明顯，香港人的信心出現危機了。

香港教會面對市民的信心危機，開始把焦點集中於對人的關心、牧養和造就，並提高「留港、建港」的意識。⁹ 基本的論調只有一個：教會是見證信仰的群體，我們所相信的上帝是掌管歷史的主宰；惟有憑信在人群中活出來，才是真正的天國子民。

四、面對「九七」及以後的日子

經歷過風雨的幼苗，它的根才能扎得深，成長才會茁壯。一九九七年已經開始了，七月一日也快到了。香港人談論了十多年的九七問題，因著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挑戰，已經有各種各樣的適應方法了。

事實上，95年以後，香港教會就如何過渡九七、邁向二十一世紀，已進行思考和探索了。有關的建議有以下三方面：

（一）**重視人才的培訓**。這包括了對平信徒的培育和教牧人員的訓練。¹⁰

（二）**鼓勵教會全力拓展**。過去十多年的體驗，教會被喚醒了不要躲在室內等候，乃要盡力奮勇向前。¹¹

（三）**預備自己貢獻中國**。中國大陸的開放和中國教會的發展，使香港與內地的交往愈趨頻密，更提醒了香港

的基督徒，可以為十二億同胞有所貢獻。¹²

五、一點心聲

1982年曾有人稱「九七」是香港歷史突破的「時機」(KAIROS)。1995年同樣有人稱「九七」是香港教會的轉機。我認為，這並非是盲目附和，更不是不經思考的抄襲。我相信，這是由於香港基督徒對上帝的堅定信靠，及經歷考驗後信心的表現(耶利米書廿九7)。

註釋：

1. 以下書籍較具代表性：

《香港教會與香港前途》，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公共政策委員會編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新聞部出版。1982.11

《迎向的年代》，香港天主教青年聯會編，新天地出版社出版。1983.11

《1997：轉變與更新》(增修本)，錢北斗編，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出版。1984.6

《1997與香港神學》，郭佩蘭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出版。1983.11

2. 參《香港教會與香港前途》，頁10。

3. 參《1997與香港神學》，頁42。

4. 參《香港教會與香港前途》，頁46。

5. 同上，頁36-37。

6. 同上，頁16。

7. 參《1997：轉變與更新》，頁75

8. 有人說這是香港人以腳來表決——移民外國——的表現。參《九七的應許》，楊牧谷著，基道書樓出版，頁16-17。

9.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於1991年推行了「我愛香港運動」，當中出版了兩冊學術論文集，由不同專家撰寫，很有參考價值。

10. 參《公義的呼喊》，郭乃弘著，基道書樓出版，1993年，頁81-82。

11. 參《特區教會透視》，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編，香港世界宣明會出版，1995年，頁15。

12. 《九七的應許》，頁59。

本文是本社社長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使者》雜誌所邀發表於該刊一篇文章的撮要。

* Publisher's Desk *

THE "97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CHRISTIANS

by Rev. Eric. S.Y. SO

"97" is the result of the wars and treatie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19th century. After Britain defeated China in the Opium War, according to the Nanjing Treaty in 1842 Hong Kong Island was ceded permanently to Britain. In 1860 China was defeated again and part of Kowloon Peninsula was granted to Britain. 38 years later in the Beijing Convention, Britain successfully negotiated a 99-year lease for the territory between Kowloon Peninsula and Shenzhen River (now named New Territories) and hundreds of islands for the period of 1898 to 1997.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whol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cludes not only Hong Kong Island and Kowloon Peninsula but also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all surrounding islands. And since 1949 China has declared that they would not recognize those "unequal" treaties. The expiration of the lease of Kowloon Peninsula/New Territories in 1997 which affects more than 90% of the area of Hong Kong is non-negotiable. The identity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her future is now at hand.

The "97 issue" has been discussed publicly since the early '80s when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visited Beijing. From 1981 to 1983 there were many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among Hong Kong Churches as well as books and articles published on related topics. As I observ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ere 3

major areas of discussion among Hong Kong Christians on the 97 issue: 1) To identify Hong Kong Christians as Chinese; 2) To be mo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society; 3) To encourage the Hong Kong churches to commit themselves to the future.

During that time we found the general atmosphere to be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But then came the ten years of hard times. From 1982 to 1991, we saw diversities of political arguments, conflicts on drafting the Basic-Law and the "4th June Event". Over 300,000 people immigrated to overseas countries. It is quite clear that Hong Kong had a crisis of confidence about the future.

Thank God that difficulties can make lives stronger. Through all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Hong Kong people were being —— prepared to face 1997.

The year 1997 has begun, 1st July will come soon. Hong Kong churches will do more on training for ministry, development for the future, and contribution to China in responding to 97 and the coming new century.

Jeremiah 29:7 reminds God's people to pray and seek the welfare of the city where they lived. Through the past experience I am sure that Hong Kong Christians will agree 1997 is not the "ending" bu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Hong Kong.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總社：香港九龍彌敦道138號五樓A座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門市部：香港九龍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電話：2385 5880

傳真：2782 5845

台灣分社：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242號9樓

電話：(02)8801647

傳真：883 4621

社長：蘇成溢

編輯：范鳳華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GENERAL OFFICE: 138 NATHAN ROAD, 4/F, A, KOWLOON, HONG KONG

BOOKROOM: 10 TUNG FONG ST., G/F, KOWLOON,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9/F, 242 SECT 4, CHENGTEH ROAD, SHILIN, TAIPEI, TAIWAN

Publisher: Eric S.Y. So Editor: Frances Fang